

Driving toward Modernity: Cars and the Live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un Zhang.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220 pp.

朱春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本書作者Zhang, Jun（張珺）是一名人類學者與城市研究學者。她師從人類學家Helen F. Siu（蕭鳳霞），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現今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系的助理教授。本書是張珺多年田野工作的成果，也由其在2009年完成的*Driving toward Modernity: an Ethnography of Automobiles in Contemporary China*博士論文改編而來。她的研究興趣包括社會變革與城市發展、移動性與階級政治、基礎設施與空間政治、亞洲的科技與社會及中國研究等等，本書的研究展現了作者多個研究興趣的交織與探索。

特別的是，本書不僅是社會科學領域對中產階級研究的補充，更是人類學領域開創性探討汽車與中產階級身份認同關係的作品。之前汽車雖然已成為全球化社會生活，亦成為中國中產階級日常消費的一部分。但汽車的發展現象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並沒有得到足夠關注，更沒有與中產階級建立足夠的學術相關性。同時，張珺的研究也用中國中產階級案例挑戰了既有的西方中產階級理論觀念，展演出社會主義制度下中產階級生活實踐的特殊性。這是一本展演了汽車移動性與中國南方中產階級糾纏關係的精彩民族志研究，聚焦在中國最富裕地區之一的珠江三角洲地帶。張珺剖析了私人汽車如何形塑了中產階級日常生活的社會性、團結性與主體性，以及汽車移動性如何形塑了中國新的中產階級。其中，主體與客體、人與物互為參照的探討方式為分析中產階級提供幫助。通過對身體與社會移動交織關係的仔細研究，本書細緻描繪出現代中國圖景，將中國現代化轉型之中的延續與斷裂、結構與機構的複雜關係全部奉上。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後汽車移動性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實踐的一個側面。張珺認為中國中產階級並非經濟上具有誇張消費慾望與政治上刻意疏離的主體，而是一群消費習慣受到汽車產業發展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影響的群體。這之中，身體的主體性與社會移動性錯綜複雜，新階級的形成也與快速轉型期的中國個體、社會與國家結合在一起。同時，在汽車移動性中凸顯出新興形成的中產階級主體性的不穩定與脆弱性。中產階級具有向上流動的可能，但同時又充滿變數。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充滿焦慮，促使中產階級個體從原子化走出，從政治性走出，對家庭成員更為關注。

2003年中國私人汽車數量開始騰飛，張珺於此時對廣州與珠三角其他城市進行田野調查。核心人群是她高中和大學時代的同學，訪談對象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官員、公務員、工程師、大學教授、企業家、律師及汽車修理工等等。她積極融入中產階級的生活，並同時對他們進行半結構化訪談。她曾在汽車經銷店實習，並進行長達十年的珠三角地區定期回訪研究。佩服作者民族志調查非常結實的同時，如果有表格或者附錄來呈現訪談人更為準確的社會學信息，將更有助於我了解這個精彩研究背後的中產群體狀況。另外因為田野開始的2003年與書籍出版的2019年確實有些距離，汽車與中產階級關係也不斷變遷。比如現今中產階級家庭購買電動汽車與汽油汽車搭配使用，或國內外旅行時進行汽車租賃等行為或許可以納入探討。

張珺對中產階級理論進行梳理，同時也對中產階級理論在中國的特殊性進行解讀。她從將階級定義為生產關係與結構化經濟機會的古典社會理論開始追溯，直到現今闡明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時期階級政治的人類學作品。在研究中產階級理論時，作者不僅考慮中國的特殊性，也對經常被忽略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文獻閱讀，比如印度、尼泊爾和巴西。這是西方視角、發展中國家、中國視角的反思性參照分析。由此，她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多維度的、需要不同行動者之間持續的談判與不斷適應的項目」。本書認為中產階級是一種用於分析的分類方式。不僅表現出權利的不平等、社會分層、消費與政策制定，也闡明了社會、歷史與政治中產生的身份認同。

具體而言，張珺確信這種缺乏穩定性與安全感的中產階級身份需要在複雜的中國階級政治背景下不斷形構。她發現中產階級研究對象置身強烈的

「中間感」、「不上不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感受之中，被困在中國的現實之中而無法上升到更高的階層。進一步的，這種高度的焦慮與不確定性影響了中產階級的行動實踐與社會互動。中國中產階級對自身獨特的階級地位是不確定的，相對而言，對自身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差異化卻是確定的。即藉助他者完成自我身份認同的探索。中國中產階級不能清晰確定我是誰與我想要什麼，反而更明確自己不是誰。他們將自身安置在高官、富豪之下，又排布在大學畢業生、農民工等群體之上。本書認為，中國中產階級更多是通過消費與生活方式界定的，其主體性更多體現在自身社會軌跡如何安排以及家庭日常生活如何開展上。中產的很多消費行為是出於家庭便利的需要，而非某種社會地位的追求或瘋狂消費的渴望。生活方式之外，張珺對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與潛力做了探討。在這裡，中國特殊性再次納入考量。她發現，無法對中國中產階級做過於教條化的解讀。廣州的中產階級並不是一群積極參與公民社會與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主體，而是一群更關注自身階級地位不可複製與不可持續的焦慮社群，他們更擔憂後代的競爭處境。

但是，這種政治疏離與潛力不充分是中國中產階級自身的主體性問題，還是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這種政治不參與行為，是自發的還是被動的？這是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還是主體的彈性化選擇？新中國成立後，階層取代了階級概念。中產階級在中國用中間階層、中產或中產階層指代，表明改革開放後不斷發展的經濟，帶來的中間收入群體的擴充。中間階層越多，經濟發展越好，貧窮人口越少。中國中產階級直到21世紀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因為此時中國政府宣佈要「擴大中間收入群體的比例」。因此，中產概念在中國本身的立足點在經濟，而不是政治，更缺乏可實踐的政治空間與制度化可能。所以追求自身發展、家庭發展與下一代發展，成為中國中產階級更現實的（唯一的）選擇？另外當緊急狀況發生，參照2020至2023年的中國疫情管制。例如上海四月之春，不論是生活物資購買還是醫療資源獲取，展現出一種魔幻的「人人平等」，中產階級與普通民眾的區別在何處？因為中產階級不斷湧現的身份認同在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區別於一般民眾，那階級分類在疫情之中，或在當下的中國，是否變得更為二元？

張珺用中國中產的主體性狀況，挑戰傳統的西方中產階級理論。同時也與現代性狀況下的個體化理論進行對話，來說明其失效之處。她的汽車移動性研究，不僅關乎中產個體，也關乎中產家庭及其社會網絡。比如車輛的選擇，經常是出於方便，而不是個體自由。自由是放置在不斷變化的家庭、工作、休閒與社交背景之下來討論的。家庭不論從情感還是道德尺度，都對個體的汽車購買與駕車實踐起到關鍵作用。中產階級的日常駕車通常圍繞著家庭展開，比如接送孩子、送父母或公婆、送大家庭成員等等，都需要更為寬敞的汽車。汽車成為連接家庭成員的物質性工具，中產階級通過汽車來維持家庭及社會關係。人的主體性展現在家庭成員中，也展現於外在的社會互動實踐中，而不是一個個孤立的自我。這一發現與全球化狀況下強調個體化、原子化是不一致的，也是作者的存疑之處。同時她認為中產階級家庭成員的緊密連接也不能單純從儒家文化本質主義出發，而是一種孝順的消費方式與生活方式選擇。

本書借移動性展開，但並沒有把汽車移動性納入地理學交通研究的框架。而是從民族志出發，娓娓道來汽車如何成為中產階級日常實踐的一部分。並通過這種日常實踐，來刻畫現代化的中國，中國的特殊性與其中產的特殊性畫卷由此展開。

